

声音排行榜

NO.1 “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不抓谁抓?”——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金融机构等负责同志座谈时强调

NO.2 “自己当时觉得好玩,就拿起了石头砸警车。”——杭州聚集事件涉案的临安籍女子张某对警方交代

NO.3 “现在有一部分国民很可悲,可以骂自己的娘,但却不可以骂美国。”——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其凤,出席北大湖南校友会成立15周年庆典发言

NO.4 “当天公开销毁的手机并不是没收的学生手机,而是老师们不用的手机。”——河南登封一中工会主席否认在例行升国旗时,将“没收”的21部手机,当着3000名师生的面摔进水盆销毁

报眼

13日《中国青年报》#《警惕“三公消费”变身为“四公五公”》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广州财政更透明,却被质疑最多,这会形成财政公开上的逆淘汰。公共财政充分地公开透明,每一项支出都可以监督,才能避免“三公消费”变身为“四公五公”。 作者 曹林

13日《新京报》#《摆脱垃圾焚烧困境,要靠分类和减量》

可以说,垃圾焚烧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摆脱这一困境,固然要地方政府去积极说服民众,拿出有诚意的态度,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化解民众疑虑。但更要看到,垃圾处理,并非只有焚烧一途。通过垃圾分类和减量,将垃圾资源化,以减少填埋焚烧,才是根本之策。 社论

13日《北京青年报》#《保护新闻线人需立法求解》

如何保护新闻线人,也许不是一道司法可以解决的难题,而需要上升到立法角度,在杜绝虚假新闻和维护新闻伦理两端作出更合理的制度设计,在特定领域采取更为特殊、更有利于保障证人权利的证据制度。 作者 舒锐

13日《南方都市报》#《愿护士节不再笼罩在“护士劫”阴影之下》

其实大多医患冲突,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都在为这个漏洞百出的医疗体制买单。体制不思改善,反而转嫁责任,造就了医患之间的二元矛盾,使他们眼中只能看见彼此的冷漠、疏离与敌意。只要医疗体制僵化如故,医生与患者的互害模式便难以打破,护士节与“护士劫”,不过一步之遥。 作者 羽戈

现在干部吃喝少了? 记者揭秘公款消费报销“潜规则”——吃的不是饭菜,而是“办公用品”

小小一张发票,写明的是消费金额、时间、地点和单位,然而很多时候,明明白白的消费背后是不明不白的公款私用现象。今年“五一”期间,一些地方纪委将整风肃纪的目光聚焦在公款消费发票上:辽宁省纪委督察组在朝阳市多家酒楼发现多张疑似公款消费的发票,北京市纪委通报“五一”期间共发现相关单位在“顺峰”“净雅”等高档餐厅消费的发票30余张……中央禁令下,发票如何“变形”?一张发票背后隐藏了多少潜规则?

公款消费下有对策

记者通过采访和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在发票上做文章、利用发票进行公款消费的公职人员、国企管理人员仍不在少数,发票也上演了一幕幕“变形记”:

“变形”一:巧立名目。一些单位或个人消费的款项不能通过财务制度报销,于是采用开具礼品、食品、耗材等类型发票的方式报销。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长勇介绍,一些餐饮单位还会与一些小的办公用品公司、文具店“合作”,以稍高于营业税的金额购买办公用品发票提供给客户,据他们办案发现,少数高端会所甚至直接注册几个“皮包公司”,专门用作开发票。

“变形”二:化整为零。据一位公务员透露,当消费金额过大时,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或超标准消费,通常会采取开具多张小额发票的方式进行报销。而为客户分割大额发票也成了部分餐饮业主招徕生意和少数行政事业单位逃避监管的奇招妙术。

“变形”三:空手套白狼。发票是单位采购报销的唯一凭证,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开单位想要的发票。于是,专门以收集倒卖发票为

工作的“职业”应运而生。据了解,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报销的需要,专门向“黄牛党”购买各种各样的发票,然后利用这些“虚假发票”套取现金。

没人愿捅破“窗户纸”

“以前请外单位吃饭,只要不是太越格,拿着发票都能报。现在公务接待管得严,还要写清楚吃什么、请谁吃、在哪吃,不然不让报,想想干脆自己掏腰包拉倒。”北京西城一家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如是说。

尽管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力度空前,然而一些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这些“禁令”往往只对单位中层以下的干部管用,一些单位“一把手”的公务消费报销仍有“门道”。

华北地区某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小李深受领导信任,领导每次出门都带着他。小李说:“其实领导们在哪吃饭都不重要,领导外出消费的开销,最终都以办公用品名义入账。”

去年以来,一些部门、单位餐费都大幅下降,财政预算却没有明显减少,那么节省的钱都去哪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将餐费报销成了办公用品,这层窗户纸大家都不愿意捅破。

小李介绍,一个县下属单位如

果每年办公用品的消耗就达100多万元,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例如,某单位的负责人以“为领导办事”为名,直接让会计准备10万元现金,最终都是以办公用品的名义入账。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各种变着花样的公款吃喝、领导出国消费,甚至在招商过程中的因私花费,最终都是要入账报销的,大部分都归为“办公用品”。因为在单位或部门,办公用品的消耗是没人查的,这是单位或部门的潜规则。

问责需要加大力度

虚假发票的横行,为少数人侵占国家资产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海南儋州原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利用职务便利,将公款报销作为敛财手段,其在儋州市任职4年多,公款消费报销共计404.94万元,仅2012年10月26日至29日的4天时间,就报销了6.7万元的住宿费和8.6万元的餐费。

海南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一些公务人员使用虚假发票进行报销,就是一种隐性腐败行为。“权晓辉之所以能通过报销的方式敛财,就是因为权力太大,而对权力的监管又不到位。”她说,要管住发票腐败,关键在于问责和监管。一旦出现问题,经手的单位负责人

和财务人员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些餐饮企业、商场、超市等为发票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也应依法追责。代红表示,虚假发票涉及税务、工商等多个部门,如果都不管,听之任之,虚假发票就会泛滥成灾。相关部门应建立联动的监管机制,加强日常稽查和信息共享,对“问题企业”监管不力的要严格问责。“只有在制度、压力之下,才会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中国式跟帖

仙风3283482083:一些官员谋私,办法从来都不缺!

funsons:发票只是工具,关键是花钱的权利由谁掌控。

锦瑟山行:有的根本不吃也不喝,就用各种票据把钱报掉。

清风郾城龙城:辨别公款消费变形还需火眼金睛。

浙大彭建宇:谁用谁知道。

东莞的酒店:小小一张发票,写明的是消费金额、时间、地点和单位,然而很多时候,明明白白的消费,背后却是不明不白的公款私用现象。

据新浪微博

名嘴说

南京电视台《东升工作室》主持人东升



“整治是彰显规矩,是让有些人变无为为有知。”——南京大光路八宝前街附近的脏乱差问题,整治没多久又回潮。对此,南京电视台《东升工作室》主持人东升在节目中直言

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听我韶韶》主持人老吴



“一百多年前的城市一下雨也不会内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就这么经不起雨水呢?”——针对深圳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听我韶韶》主持人老吴在节目中感叹

江苏城市频道《零距离》主持人大林



“无论是城市的地标建筑还是普通的道路街道,不能说建就建说改就改,每几年就换个风格,这都是钱啊。”——就南京太阳宫的“金色皇冠”被拆,江苏城市频道《零距离》主持人大林认为

央视《晚间新闻》主持人赵普



“罚就是让违法单位今后不敢造次,奖就是让为环保出力的人信心满满。”——第八届中华宝钢环境奖在京颁奖,与此同时北京开出30万元大气污染最大罚单。对此,央视《晚间新闻》主持人赵普在节目中谈到

锐评论

“照妖镜”里看不见社区自治的“风水”

日前,无锡一小区两栋楼之间发生“战事”:45号楼一户人家因生意不好,就听从风水师的建议,在外窗安装了几面“照妖镜”,并配上符咒。“照妖镜”正对着的50号楼的居民,安装射灯保护自家风水,并希望对方拆除“照妖镜”。

(详见昨日《现代快报》)

两家斗法,其行为已经从个人空间跑出来,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界限。可见,居民已经意识到个人空间的重要性,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保护此种权利。只是,个人空间与公共场所同处一地,公众没有真正清楚二者的界限。所以,“照妖镜”和大射灯才能理直气壮地出现,结果其他居民的个人和公共空间都受到侵犯。

仔细审视,小区里的个人空间

和公共场所关系并不复杂,但要想和睦相处,社区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前者是个人利益,后者包含部分个人利益,容易陷入无主的公地悲剧,人们都过分侵占,让他人为公共场所买单。社区自治可以让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合理博弈,并最终确立约定俗成的自治章程,人人都明白个人空间的界限和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如此居民才能有一个和谐家园。

猪八戒能从镜子里看出丑陋,“照妖镜”和大射灯能从生活的哈哈镜里发现社区管理的不足。如果能借机厘清个人空间和公共场所的界限,现代文明沐浴的风水才会流淌在小区各处和居民心间。

河北 赵查理

自断双脚的男子可以朝谁喊救命

安徽定远44岁的刘敦和腿部感染,不久前,他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用摔碎的茶杯碎片将自己双脚割掉。(详见今日快报A4版)

一个农民,因为没有钱,受伤的双脚得不到治疗,只好自断双脚,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也许有人会想到,现在多数地方的都有医保,居民即便没有办医保,有困难也可以申请救济。只是,当地村民是否相信,有困难可以找政府?如果找到政府,政府又会不会管?或许这才问题的关键。如果当地救助机制非常完善,政府部门又尽职尽责,自断双脚的悲剧绝不可能发生。“不知道”不是推脱责任的借口,不成“负面新闻”就“不关心”,才是问题的本质。

自断双脚的惨剧背后,我们必

须反思:社会保障制度有没有覆盖到像刘敦和这样的弱势群体?我们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如何更好地将阳光普照到刘敦和们的身上?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连创新高,为什么刘敦和却只能自断双脚?有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机构,可以倾听那些无线治病者的求助?

广州市一笔预算1亿元的救助重症病人的转移支付款项项目,执行为零;安徽各地将车牌号码竞价所得资金,专门用于道路交通事故救助,但这些钱基本分文未动……一边是无线治病的悲剧和悲情求助,一边却是政府性公共基金睡大觉,类似现象绝非个案。抓小偷可以找公安,能不能也明确告诉刘敦和们:当他们无线治病想要寻求医疗救助时,可以找谁喊救命? 湖南 舒圣祥